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五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九一八”国难	(1)
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	(1)
石原构想	(7)
“九·一八”事变	(10)
东三省沦丧	(14)
事变中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17)
伪满洲国开场	(22)
“一·二八”上海抗战	(26)
人民群众的抗日浪潮	(31)
东北义勇军的崛起和失败	(38)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42)
察东事件	(42)
“何梅协定”	(48)
“河北事件”	(50)
“一·二九”运动	(53)
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	(58)
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	(62)
瓦窑堡会议和中共白区工作的转变	(62)

“共组北方联合战线”.....	(67)
国民党政策的变化.....	(73)
“打通共产党的关系”.....	(79)
国共上层的初步接触.....	(83)
西安事变与国共第二次合作.....	(89)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89)
两广事变.....	(95)
蒋介石支持的绥远抗战	(102)
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的关系.....	(105)
从洛川会谈到肤施会谈	(110)
西安事变的爆发	(114)
事变震惊中外	(118)
释蒋和平解决	(123)
卢沟桥事变：抗日高潮的掀起.....	(131)
卢沟桥的枪声	(131)
中日双方对事变的反应	(140)
七七事变后的战端	(152)
国共第二次握手与抗战高潮的掀起	(161)
华北争夺战	(168)

“九一八”国难

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

1927年4月，日本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动，若井内阁倒台，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任日本政府首相兼外相，组成新内阁。田中义一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要代表人物，一贯热衷于侵华，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他上台后，积极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以急进的武力侵略中国东北、扩大侵华的“田中外交”，取代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蚕食中国的“币原外交”。田中并起用日本狂热的侵华骨干分子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

6月27日至7月7日，为制定日本侵华政策、特别是侵略东北的政策，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陆军、海军及关东厅等各方面重要官员。

会议的重点就是研讨中国政局和日本的对策。会议结果集中反映在田中义一所作《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中。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卢称“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日本在

对华政策上，“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日本“要予以特殊的考虑”，并“不能不负有特殊责任”。这表明日本要加紧对“满蒙”、特别是对东三省的侵略。

第二，表示支持“中国稳健分子”的“正当的国民要求”，当“发生成立统一政府的时机”到来之时“则不问其所在地如何，日本当与各国同表欢迎”。但东三省政局的稳定，要靠“东三省人自己努力”。意即东三省是被排除在中国“统一”之外的，日本只支持东三省之外的“统一”。

第三，声言“在中国有侵犯帝国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之虞时，必要时，将断然作出自卫措施，以维护之。”就是说，日本要用武力保护其在华权益。

第四，表示“东三省有力人士如能尊重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认真地探讨稳定该地政局的办法，则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的支持。”即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是以张继续“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为条件的。

田中的训令表明，日本将把东北置于日军武力控制之下，对于中国内政，日本也将进行武力干涉。因此，东方会议是日本加紧推行其早已确定的大陆扩张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东方会议的实际主持者、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在伪满洲国建立不久，1932年6月一次“时局演讲”中供称，东方会议的内容，“就其要点说，即满洲的主权’……不仅仅属于中国，日本也有参与这种主权的权利。因

此，维持满洲治安的责任在于日本。”

列席东方会议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后来也供认，东方会议的内容“是为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共有四点决议；（1）对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要同张作霖进行，因为张作霖是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只有支持他，由他解决满蒙问题；（2）张作霖有很多军队，耗费巨大，苛敛暴税，将来由国内败退后不必要保留那么多军队，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解除其武装。此事由关东军负责，必要时由朝鲜军支援；（3）关东军与朝鲜军即时开始做好准备；（4）奉军如果败退的话，以北京芳泽公使发表声明，因日本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反对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为加快实施侵略中国东北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日至17日，日本又在中国大连召开了“大连会议”（第二次东方会议）。会议由森恪主持，有芳泽谦吉、吉田茂、儿玉秀雄、武藤信义等参加，进一步策划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方针。

东方会议之后，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的内容起草了一份题为《对满蒙积极政策奏章》，由田中自己领衔，铁道大臣、大藏大臣等署名，上呈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其代向日皇密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出笼，外界即有风传。当时中国方面曾积极设法取得此件。1928年五六月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王家桢，密托旅居东京的台湾商人蔡智堪设法寻找。王在给蔡的密信中说，“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密件，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人手。用费多少不

计。”

蔡智堪与日本政界人上交往甚密，常向王家桢提供日本政治内幕的情况。他接到王家桢的密信后，立即进行活动，谋取田中奏折。

据蔡智堪 1953 年回忆，他为获取田中奏折，首先与关系密切的前日本内务大臣、民政党成员床次竹二郎联系，请床次帮助。数日后，床次告诉蔡说，日本保皇党反对田中内阁武力吞并满蒙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因此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他们想利用“田中奏折”一事，在国际上宣传，引起英、美等国的注意和反对，以抑制田中派。不久，床次又告诉蔡，日本内务大臣牧野伸显伯爵（民政党顾问）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诸于世，他就可密许蔡去抄写奏章。蔡遂向王家桢请示，王密电答允。于是，蔡经牧野帮助，在牧野妾弟、皇室书库管理官员山下勇带领下，于 1928 年 6 月间的一个夜间，秘密进入皇室书库，偷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系用“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页，标签“田中首相奏章”。蔡将碳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描出，所用碳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由于篇幅较长，蔡费时两夜，才细心抄毕。后来，蔡将抄录的田中奏折秘密带到沈阳，交给王家桢。另据王家桢后来回忆，田中奏折是由他交办公室，译成中文，并印 200 册；译出之后，面呈张学良，时间是 1929 年春天。

中国方面得到田中奏折后，于 1929 年 12 月在南京《时事月报》杂志一卷二期用中译本将其公诸于世。

田中奏折中译本共约 2.4 万字，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提出了日本以侵占“满蒙”为基地、进而征服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对外扩张总战略。奏折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洲；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这是田中奏折的中心。

第二，确定美国、苏联是日本侵略中国、征服世界的主要障碍和对手。奏折认为，日本占领“满蒙”后，美国“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同时，日本向“满蒙”扩张，特别是向“北满”扩张，“必须与赤俄冲突；斯时也，我仍以日俄战争，依样葫芦，攫取东清铁路，以代南满铁路；攫取吉林，以代大连。因北满之富源，我国再与赤俄一角逐于南满旷野者，实为国运之发展上势所难免。”

第三，歪曲历史，否认“满蒙”为中国领土。奏折开篇盛赞“满蒙”之富饶：“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

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不准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但接着便声称，“满蒙非支那领土”。奏折说：日本学者“尽力研究支那历史，无不以满蒙非支那之领土”。但日俄战争时，日本的直战布告“明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条约“亦认满蒙为支那领土”，这使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认支那为主权”，“而“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奏折表示，“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第四，主张征服“满蒙”必须实行“铁血主义”。“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只有“以铁与血卞义”，才能“保东三省”。所谓“铁血主义”，即以残酷的战争手段，达到侵略的目的。

此外，奏折还提出要完全控制东北“交通大动脉”、利用朝鲜移民向“满蒙”渗透、扩大对“满蒙”的经济侵略等扩张方案。

总之，“田中奏折”是一份精心炮制的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而其核心是奉行对“满蒙”的所谓“积极政策”，即积极吞并“满蒙”的政策。但是，由于奏折原件至今没有发现，所以半个多世纪来，对奏折真伪问题一直有争论。日本官方人士和大部分史学研究者矢口否认它的存在，认为由中国方面披露出来的这个文件不会是出自田中之手，而是由其他日本人或中国人，或日本人与中国

人合作写出的，因此称其为“伪体”。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是持“伪造”说，认为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的侵略性质是不容否定的，但流传的“田中奏折”并非真品，不可能出自田中之手。二是持“存在”说，认为这份奏折“涉及内容之广泛，设计之详尽，计划之周密，非一般的人所能做到”。不能以实物的发现与否来确定这一奏折的真伪，战前日本许多重要机密文件，都因披露出来会不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被湮没。况且，当事人蔡智堪、王家桢对奏折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三是持“体现”说，认为无论奏折是否出自田中本人之手，它都体现了日本统治阶级的扩张意志和侵略野心，奏折是当时历史的产物，不是个别人的思想。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日本官方人士和史学研究者否认奏折的存在，但也不能不承认，后来日本所采取的对华政策和战争政策，与此奏折是一致的。

石原构想

东方会议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为武装侵占东北，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其中，关东军参谋、作战部主任石原所起草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和《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等，比较具体地提出了强占东北的构想。石原1928年10月到东北后，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调查活动。这两个文件就是他在1929年7月进行

的“北满参谋旅行”的军事调查活动中起草的。

在《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中，石原将侵略中国东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用武力肃清“满蒙”中国军队，扫荡军阀官僚，没收其公私财产；第二，对“满蒙”实行统治；以实施最简明军政，确实维持治安；第三，确保“满蒙国防”，以约4个师团兵力防备俄国之入侵。

在《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中，石原进一步提出占领“统治支那之根本要领”，即：一在满蒙及热河特别地区，设“满蒙”总督，完全以日本军队维持治安；二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察哈尔特别地区，设黄河总督；三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地区，设长江总督；四在湖北、湖南地区，设湖广总督；五在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外蒙地区，设西方总督；六在广东、广西地区，设南方总督；七在四川、云南、贵州、川边特别地区，设西南总督。黄河总督、长江总督、湖广总督、西方总督、南方总督、西南总督通常任用支那人担任，并以支那军队维持治安为原则。

1930年9月，关东军大尉佐久亮间三根据石原的占领满蒙计划，完成《关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的研究》报告，提出占领东北后的行政统治、经济文化教育统治的安排，并提出要执行“以战养战”的原则，来支持日本对外的长期作战。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也和石原莞尔一道，积极筹划日本侵略“满蒙”的计划。1931年3月，板垣还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

话，散布“满蒙”是“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必须用武力侵占东北，因为“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他并认为，“在对俄作战，满蒙是主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

日本军部也在积极制订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1930年11月，在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草拟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其中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步骤：

一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

二使这一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三实现对满蒙的占领。

次年6月11日，日本陆相南次郎秘密组织由建川主持的委员会（即五课长会议），负责制订一个侵略中国东北的纲领性文件。6月19日，拟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规定了日本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即大约有一年的准备时间。在这一年中，关东军要“隐忍持重”。

总之，从关东军到日本军部，都在积极制订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方案，东北已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中。

“九·一八”事变

进入 1931 年，日本关东军加快了侵吞中国东北的步骤。石原、板垣认为不能按照军部规定的一年以后再采取行动的计划行事，要提前进行。7 月，石原等人提出《关于形势判断的意见》，主张不能等一年，要立即动手，不能坐等机会，而要自己动手制造战争借口。他们与国内的狂热侵华分子紧密联络，串通一气，加紧部署侵占东北的军事行动。

为适应武力侵占东北的需要，日本军部在军事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和部署。同年 4 月中旬，日本军部调驻仙台的第七师团代替第十六师团到东北接防，因第二师团的士兵大多来源于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比较适合于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8 月 1 日，以侵华老手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为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8 月 18 日，原天津特务机关长、“中国通”土肥原贤二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7 月份，经军部批准，日军将两门 24 厘米口径的榴弹炮从东京运到沈阳，安装在日军守备第二大队兵营，一门对准中国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另一门对准沈阳飞机场。

这时，阎锡山、石友三、韩复榘在华北结成反张同盟。石友三率五六万人在河北顺德一带叛变，向东北军进攻。为对付阎、石、韩反张同盟，张学良把东北军 16 个

精锐步兵旅和仅有的个骑兵旅、3个炮兵旅调入关内。东北军的大批入关，造成了东北防务的空虚。

在日本侵略者加紧进行侵占东北的具体部署和准备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两个事件，进一步加紧侵略活动。

万宝山位于长春市以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1931年4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地500响（一响合15亩），租期10年。随后，郝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将上述上地转租给朝鲜人李升薰等人耕种。李升薰等为了引水灌渠，召集180余名朝鲜人在伊通河上游截流筑坝，并挖了一条宽深各约3丈、长达20华里的引水渠。由于引水渠占用了当地中国农民的许多上地，受到侵害的农民遂要求长春县政府出面制止李升薰等人的非法活动。5月15日，长春县政府派警察到万宝山地区，命令李升薰等停止挖渠。与此同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也派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支持李升薰等人。由于交涉无效，7月1日，500余名愤怒的中国农民开始将李升薰等人挖掘的水渠填平。次日，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向中国农民开枪，中国农民有多人受伤。7月3日，在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的武装保护下，李升薰等人继续挖渠引水，并于11日通水。

事件中并无朝鲜人受伤，但日本却大肆造谣说中国人排斥并打伤了朝鲜人，以此煽动朝鲜排华。结果，从7月3日到9日的一个星期内，朝鲜境内就有109名华人被杀，160余名华人受伤。日本反动势力还纷纷活动，鼓吹借此

对东北使用武力。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外交部于7月7日向日本提出抗议。7月22日又正式照会日本政府：将万宝山日警撤走，令韩农搬走，取消租约，赔偿中国农民损失，恢复土地原状。后经多次交涉，日方同意撤退万宝山日警，对其余要求则拖延不做答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有关万宝山事件的交涉也随即终止。

万宝山事件风波未平，又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其部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到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当时，这一地区是禁止外国人参观游历的地区。6月26日，化装成农业技师的中村及随员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和一名充当向导的蒙古人、一名白俄被中国驻军逮捕，从他们身上和行李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一支手枪。驻军确认中村等人是军事间谍，于当日晚将他们4人秘密处死。

7月，日本关东军得到并查证了中村等人被杀的消息。8月11日，日本政府将中村等人被杀的情况公诸于世，但却隐瞒了中村等人所进行的间谍活动。日本除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外，又大造舆论，煽动反华，威胁要用武力解决这一事件。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于9月上旬承认处死中村等人的事实，还采取妥协办法，逮捕了屯垦军第三团团团长关玉衡。但日本军方已决心利用这一事件来扩大事态。8月24日，陆军省向外务省提交“断然举行有保障占领满洲”的方案。9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要以中村

事件为借口，采取强硬政策。日本关东军更是积极进行武力侵略东北的准备。

1931年春，关东军已选择沈阳北郊柳条湖地区作为制造事端、挑动战争的地点。在“九一八”之前，板垣、石原、花谷正等关东军阴谋集团成员预定在9月28日发动战争，并计划该日在柳条湖附近爆炸南满铁路，然后证指为中方所为，日军以此作借口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迅速占领沈阳。9月中旬，由于这一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关东军出其计划受到阻止，遂提前采取行动，当时，驻在东北各地的日本关东军共有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还有关东宪兵团，总兵力共有2万多人。

9月18日夜10时20分，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按预定计划自行炸毁了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当时，被炸毁的这段路轨为东侧单轨，位于两根路轨的接头处，炸断部分仅为1.5米。爆炸后不久，从长春开来的第14次列车摇晃着从被炸地点开过。日军士兵还将被其枪杀的三名乞丐的尸体穿上中国士兵的服装，摆在柳条湖事件的现场，诬指他们是爆炸铁路的凶犯。

11时18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日本陆相南次郎发电，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板垣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接连下达了四道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命令。9月19日凌晨1时30分至2

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布了由石原起草的八项电令，除命令日军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外，还令日军有关部队向沈阳集中，支援进攻沈阳的日军。

9月18日夜間時左右，日军第五独立守备大队开始向东北军第七旅驻地沈阳北大营进攻，该旅在得到“不准抵抗”的指示后，向东三咀子撤走。19日凌晨5时左右，日军占领北大营，6时30分许完全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化装逃出沈阳。同日，日军侵占安东、营口、凤凰城、长春。20日占领满铁沿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在日军的进攻中，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一部曾对日军进行阻击；驻守在长春附近南岭和二道沟的东北军部队也曾给进攻之敌以一定杀伤。日军占领沈阳后，中国东三省航空处飞机260架沈阳兵工厂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悉被日军掠去。

东三省沦丧

1931年9月19日7时，日本军部在接到关东军的报告后，立即召开会议，一致同意给关东军增援兵力，表明日本军部完全支持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3个小时后，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事态以不扩大超过现在程度为方针”，24日，日本政府公开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正式宣布“不扩大”方针。但同时又宣称，日